

离散、记忆与家国

——论民国初年的香港词坛

张宏生

内容提要 鸦片战争后，香港被割让给英国，词体创作中，开始有了浓厚的香港情结。辛亥革命后，一批文化人流寓香港，成为遗老。他们在词体创作中眷念前朝，将故国之思和失地之痛结合在一起，构建了具有地方特色和普遍意义的文化记忆。他们的创作延续了清代嘉庆、道光以来盛行一时的常州词派学说，体现了岭南词学一脉在香港的发展。作为清末民初之际遗民文化的一环，他们的创作活动和北京、天津、青岛、上海等地遥相呼应，构成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。

关键词 香港；辛亥；遗民；文化记忆；家国

一 家国之感与香港意识

在中国文学史上，香港是比较迟才出现的一个地理概念。不过，它一出现就和近代社会风云变幻的大变动联系在一起，本身也是那个时代的生动而深刻的反映。

鸦片战争后，中国和英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，割让了香港。这一事件在知识分子心中产生了巨大的震动，因为即使他们以前可能并不知道香港这个地方，但还笼罩着“盛世”余晖的人们，很难接受割地求和的耻辱，且对象还是以往并不怎么放在眼里的英国人。因此，他们也及时将自己的愤懑写进了作品。如左宗棠《感事》四首之三：“王土孰容营狡窟，岩疆何意失雄台。痴儿盍亦看蛙怒，愚鬼翻甘导虎来。借剑愿先卿子贵，请缨长盼侍中才。群公自有安攘略，漫说忧时到草莱。”^[1]诗写于道光二十一年（1841），这年一月，琦善和义律谈判，签订《穿鼻条约》，擅自将香港割让给英国，虽然并没有得到清廷的承认，但英国军队顺势已经占领香港岛。左诗将领土被强占之恨，上位者丧权辱国之耻，以及爱国者请缨杀敌、收复失地的愿望之强，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。钱仲联《清诗纪事》

曾论其写作背景：“是年英人据香港，总督琦善速问。清军战，数不利。英船进逼广州，季高感于国是，愤懑而作。”^[2]

词坛上写香港的作品则出现得较迟。据目前掌握的资料，光绪三十年（1904），晚清词坛领袖朱祖谋担任广东学政时，曾经短期居于香港，写有两篇词作，分别是《夜飞鹊·香港秋眺，怀公度》和《清平乐·夜发香港》，这应该是内地作家书写香港的较早作品。前一首主要是写对香港被割让出去的悲愤，后一首则主要从香港在地的角度去写，云：“舷灯渐灭。沙动荒荒月。极目天低无去鹖，何处中原一发。江湖息影初程。舵楼一笛风生。不信狂涛东驶，蛟龙偶语分明。”^[3]“中原一发”，用苏轼《澄迈驿通潮阁二首》之二：“余生欲老海南村，帝遣巫阳召我魂。杳杳天低鹄没处，青山一发是中原。”^[4]借以表达沦为殖民地的香港人对祖国的怀念。

朱祖谋在晚清有着极大的影响力。不仅体现在他所提倡的词风，笼罩一时，而且体现在他出任广东学政后，直接对当地的词人有所引导。另外，他在民国之后作为遗民的处世姿态，也是当时人们所非常关注的。因此，他的这类创作中所体现的家国意识，也就或隐或现地可以在辛亥之后的香港词坛

得到回应。

在文学史上，真正对香港的吟咏之作，是明代才开始的。特别是香港开埠后，南来北往的文人过此，往往留下诗篇^[5]。19世纪末、20世纪初，由于特定的地缘关系和民族文化心理，聚集此地的文人大大增加。仅统计有作品集出版的文人，就已达102人，其中清末来港者13人，辛亥革命前后来港者47人，1920—1930年代来港者42人^[6]，如黎国廉、刘景堂、陈步墀、吴道镛、陈伯陶、苏泽东、丁仁长、张学华、何藻翔、赖际熙、江孔殷、岑光樾、温肃、俞安鼎、崔师贯、叶翰华、韩文举等^[7]，都堪称一时名流。这些文人，往往具有遗民意识。正如当时著名遗老温肃的描述：“香港为华洋杂处之地，自辛亥以来，遗臣逋客之避乱者皆赴之。”^[8]这就使得香港俨然成为当时略可和北京、天津、青岛、上海等地相比观的一个遗老聚集的地区。

这些寓港文化人，不仅精于诗学，而且对于词的创作和词学的探讨，也有着极大的热情。刘景堂在为黎国廉的《玉蕊楼词钞》作跋时曾这样记载：“余癸丑、甲寅间旅居香港，与六禾（按黎国廉号六禾）丈比邻。丈导余为词，析四声，辨雅俗，春秋佳日，唱酬无间。”^[9]癸丑、甲寅即1913年和1914年，当时黎国廉对民国建立后的某些乱象很不满意，因而南来，寓居香港。黎比刘景堂大20岁，他在这里以词学指导后学，具有指标性的意义。当时遗民词人的创作，表现了特定的文化精神、身份认同、词学传统和地域观念等，和这些先辈的引导也不无关系。

二 离散书写与遗民心绪

辛亥革命前后的一段时间是香港历史上较早的一次移民潮，南来的这批文人，大致上也可以定位为文化遗民，往往对辛亥革命导致的改朝换代持抵触情绪，眷恋前朝，秉持孤忠，从一个方面，显示出其特定的文化价值观。

1922年，香港成立了文学研究社，当时的《汾江粹报》发表贺辞说：“慨圣贤之道衰兮，邪说雌黄；致名教之日消兮，文学不彰。”^[10]这里所针对

的，显然是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所引起的传统崩坏与文化巨变，但对“圣贤之道”的提倡，对“名教”的关注，无疑是他们的基本思想，也是他们在离散、流亡生活中重要的精神支撑。

这种基本思想和精神，也构建了他们的群体意识，其中的主要体现形式，就是建立诗社，举行雅集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在香港，20世纪初有海外吟社、潜社、香海吟社等，20世纪20年代有联爱诗社、竹林诗社、北山诗社等。正如何乃文等的描述：“昔香港开埠未久，而国遭离乱。士庶南来，志不得伸。于是诗社立，吟咏兴。社员以近体嗟身世，怀家国。兴寄之风，于兹传响。”^[11]

这种群体活动，有时是面对一些与中原文化有所关联的特定地标展开，如宋王台等。宋王台是香港的一处重要古迹，是为纪念陆录夫背负帝昷投海而建，嘉庆间所修之《新安县志》在其《胜迹略》中曾有简单记载：“宋王台，在官富之东，有盘石，方平数丈。昔帝昷驻蹕于此，台侧巨石旧有宋王台三字。”^[12]1839年，林则徐条陈中、英之间的海上摩擦纠纷，曾提到：“复札驻守九龙之参将赖恩爵、都司洪名香，驻守宋王台之参将张斌，亦皆就近督带兵械，移至官涌，并力夹击。”^[13]可见，当时这里作为军事的意义更多一些。宋王台进入文化的视野，大约主要和陈伯陶有关。陈伯陶来到香港后，隐居于九龙城，对宋王台的地标意义给与了特别的重视，因而做了许多考据工作。他的考据虽然不一定有坚实的文献基础，但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时文人的心理期待^[14]。1916年9月17日，他主持宋台秋唱，敬祝南宋东莞遗民赵必豫生日，吸引了不少遗老参加或唱和。这些往往有着深沉的故国之思的作品，后由苏泽东辑成《宋台秋唱》出版。其中的词作，如黄慈博《贺新郎·祝秋晓先生生日次和》^[15]，古今相接，有着很深的感慨。这个“宋台”实际上连接着“西台”。如陈兆年《齐天乐·秋日宋皇台》：“登台吟望禁风雨，杜陵惯愁诗思。剩水残山，芜城片石，痛绝偏安无地。闻鸡强起。纵拔剑高歌，短英雄气。冷月荒江，秋心还写苦寒味。冬青谁记杜宇。问西台恸哭，泪痕余几。宋帝陵碑，杨侯庙碣，忍考崖门遗事。人间何世。且放胆题糕，临风一醉。待到重阳，再危栏共

倚。”^[16]里面用了谢翱南宋灭亡后登严陵登西台痛哭，怀念文天祥等人之事，正好可以和寓港诸老在宋王台的雅集相比附。这种不合时宜的孤臣孽子之心，是他们的文化坚持，也是他们试图延续的文化理想。他们在殖民地建立起宋朝历史的正统想象，不仅是对前朝的文化留恋，同时也承接朱祖谋等人的香港意识，“等同在进行另一种的夷夏之辨”^[17]。于是，这个保留在殖民地的中原正统遗存，就成了他们内心的“礼失而求诸野”的隐微说明，带有了几分故国的意味：“山非今日，城犹故国斜阳里。听寒潮、咽危石，空留赵家遗址。”^[18]

群体活动中的山水登临，也有感情的激荡。大帽山在新界中部，是香港最高峰，可以俯瞰全岛，当然也可以北望神州。1916年元月，黎国廉召集张学华、刘伯端等登上大帽山的妙高台，作诗酒文会。张学华有《百字令》一首纪之：“看灯节近，正月华如水，春波摇绿。放眼海天同一色，俯仰快然意足。旧梦假红（自注：‘少筠以旧作艳体诗出示。’），新词刻翠，咳唾成珠玉。闲愁阁起，与君共泛芳醪。 怜伊风露宵深，素娥倩影，伴庭前花木。一样清光千里共，试问天心谁属。横槊当年，吹笙何处，莫唱南飞曲（自注：‘时滇南起兵讨袁，战事方急’）。疏狂容我，楼头醉倚横竹。”^[19]词人和友人一起登山赏月，似乎暗示着要唤回过往的一段美好，而把现在的“闲愁阁起”。但北望神州，顿起波澜。1915年末，袁世凯拟恢复帝制，引起举国震荡，次年就有蔡锷等人在云南发动护国战争，使得袁世凯的图谋胎死腹中。对此，作为清朝的遗老，张氏的心情显然是复杂的，他在词中特别点出：“时滇南起兵讨袁，战事方急。”却又用“莫唱南飞曲”一语轻轻带过，耐人寻味。同样的情绪，也见于当时一起登临的刘伯端词中，其《念奴娇·正月十二季裴丈招饮妙高台，以词属和，即步原韵》的下片写到：“遥看倒影山河，前朝遗恨，荒苑余乔木。欲补金瓯无好手，此意更谁相属。当日诸公，琼楼高处，曾听霓裳曲。故园如梦，何时归问松竹。”^[20]见到神州大地的战乱，自己不能有裨于时，深感惭愧，而故国茫茫，也不知何时才能返乡。不管其政治见解如何，这样的作品，在香港可以自成一个系列。往前推，有

陈步暉写于1909年的《大江东去·寄题家芷云参军龙庆“戎装策马图”，用东坡赤壁韵》，下片云：“……救国虽无柯斧假，忍看神州沉灭。东盼辽阳，南怀澳界（自注：‘时闻岛交涉及澳门划界’），气壮冲冠发。天涯题画，独骑瘦马残月。”^[21]“南怀澳界”，是写中葡双方关于查勘澳门界址事。谈判中，中方对主权问题态度强硬，而葡方不但通过外交途径拉拢英国对清廷施压，还炫耀武力，意在威胁。这些都让作者认识到身处弱肉强食的世界，尚武强兵的重要性。往后延，则可见于1924年重阳节十多位寓港文人北山堂雅集调寄《贺新郎》的唱和，何冰甫作《贺新郎·甲子重九香港北山堂雅集用后村韵》^[22]，显然是写民国建立之后的军阀混战，其中的“想吴中、战场傍菊，离披多少”云云，应指1924年9月3日至10月13日中华民国江苏督军齐燮元与浙江督军卢永祥之间进行的战争。战火从江苏宜兴燃起，逐渐蔓延到浙江，共打了一个多月。这是直系与反直系军阀之间的一次重大较量，在当时影响非常大。可见，虽然僻居海隅，这些文人忧患的目光，一直没有离开中国大地。这些相关内容，应该是他们在诗酒之会时的重要话题。

香港虽是岭南风情，但毕竟是殖民地。诸故老流寓此地，面对异乡（失地）风光和事物，不免要有所反映，其中也能看出一些微妙的心灵活动。如陈步暉《菩萨蛮·答伯端春江春日杂咏四阙》（引其三、四）

杨花朝落愉园径。秋千暮上墙头影。门外逐香车。鞭丝夕照斜。 当时觞咏地。往事休提起。风月自年年。诉春春可怜。（其三）

石塘塘水如油绿。鸳鸯好梦还双宿。有梦莫惊醒。凭他好处行。 放歌宜纵酒。十里灯如昼。珍重语刘郎。春归思故乡。（其四）^[23]

这四首词写在港岛的春日游观，是当时寓港诸老生活的一个侧面的表现。第三首写20世纪初港岛的两大重要消闲去处之一的跑马地愉园游乐场，从一个侧面再现了此处的觞咏游乐之盛。第四首所写的石塘，20世纪初是著名的妓寨所在地，色情业非常发达，据说达数百间之多，素有“塘西

风月”之称。词中的“鸳鸯好梦”“十里华灯”等，都是对那个当日繁华之地的如实记载。不过这四首词又有其特殊的内蕴。从创作形式看，似乎对韦庄《菩萨蛮》五首有所模仿。对韦的这五首词，陈廷焯《云韶集》评云：“一幅春水画图。意中是思乡，笔下却说江南风景好，真正泪溢中肠，无人省得。”^[24]陈词在欢乐的描写中，也蕴涵着漂泊之情，就其表达看，揉和了不同的经典文本，如第一首的“隔江无数山”，就出自辛弃疾《菩萨蛮》：“西北望长安。可怜无数山。”^[25]其中有怀念故乡、故国之意。如第四首的“放歌宜纵酒”，就出自杜甫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》：“白日放歌须纵酒，青春作伴好还乡。”^[26]高歌还乡，当然也是当时文人心中的期待。因为，这里虽然繁华，却并不是自己的故土，就像崔师贯《六丑·港山夜眺示友》，乃感于“西人商于市而家山顶，莫辄趁缆车归，车背山而升”而作，从其内容看，所写或是太平山顶，当时为英国富人所居。在作者笔下，景色壮观美丽，生活富庶繁华，但下片接着就写：“烟霞分昔。念青芜故国。有旧时明月，曾共历。天涯惯渡逋客。怕重来化鹤，讶看愁昔。非吾土、又逢今夕。”^[27]这种“虽信美而非吾土兮”^[28]的感情，正是他们虽处在这个花花世界，却始终心向故国的真实写照。不管他们实际上过着什么样的生活，他们的精神始终无法安定，这也构成了他们的相关作品的共同底色。

三 心灵创伤与文化记忆

创伤是文学的重要书写内容，也是文化的重要体现形式。创伤构成记忆，记忆需要表达。但这种表达不一定是直接的，也不一定完全局限在抒情主体的自身。

中国一向有着深厚的史学传统。历史在，记忆就在；记忆在，文化就在。文化在，则国之脉存。因此，在易代之际，就有金代元好问编《中州集》，“大致主于借诗以存史”^[29]。明代程敏政编《宋遗民录》，以及清初朱明德编《广宋遗民录》等，也是出于同样的动机。朱氏之作由清初大儒顾炎武作序，揭出其“于宋之遗民，有一言一行或其姓氏之

留于一二名人之集者，尽举而笔之书，所谓今人不可得，而慨想于千载以上之人者也”的特色，并表彰其“以存人类于天下”，“冀人道之犹未绝”的主旨^[30]。对于改朝换代之际遗民的事迹记述和气节表彰，是文化记忆的一个重要内容，也形成了一些广为人知的文化符号。前述寓港诸遗老的宋王台唱和，可以看作是对这一传统的延续。

但是，在延续这一文化传统时，寓港诸遗老也有自己的特色：对地方性的强调。这是由于他们多来自于广东一带，地方文化和他们的身份认同密切相关。如陈伯陶撰有《宋东莞遗民录》和《胜朝粤东遗民录》等，大力表彰东莞的宋遗民和粤东的明遗民，不仅是自我期许，更是一种带有地方性荣耀的记忆；不仅是要广泛推崇节义气格，更是希望对岭南，特别是对生活在香港的岭南人士有激励作用。他在后者的序中说：“明季士大夫，敦尚节义，死事之烈，为前史所未有。盛矣哉！而嘉遁尤盛。当时海内大儒，若梨洲、亭林、夏峰、二曲、杨园、桴亭、船山、晚村辈，未闻有如许鲁斋之仕元者。尚不可更仆数也。盖明季吾粤风俗以殉死为荣，降附为耻。国亡之后，遂相率而不仕、不试，以自全其大节。其相副以忠义，亦有可观者。”^[31]在他看来，这种“吾粤风俗”当然应该保持下来，发扬下去。

与此一脉相承，他们在创作中也会从广东前贤那里去寻找资源。如陈步墀《明月生南浦·题番禺屈翁山先生（大均）遗像》：“万壑奔涛诗衍派（自注：盘麓王瑛序先生诗谓‘万壑奔涛，一泻千里’），心在诸陵（自注：先生哭顾宁人诗有‘一代无人知日月，诸陵有尔即春秋’句），未许纲常坏。日月升沉时不再。有人图像流天外。归死罗浮休也慨。为宦为僧，当是神明代（自注：世称先生为明僧一灵云）。此际题词来下拜。斧斤偏向班门卖。”^[32]屈大均是广东番禺人，顺治三年（1646）清军陷广州后，他追随其师陈邦彦参加抗清活动，遭到挫折后，削发为僧，云游四海，曾和郑成功联络，欲引导其舟师，反攻江南。他曾到访南京，拜谒明孝陵，也曾专门前往北京景山，凭吊崇祯死所。后归乡潜心著述，成《皇明四朝成仁录》《广东新语》《道援堂集》等多种。作为意志坚

定的遗民，他俨然成为岭南地区的一座风标：“吾粤自宋崔清献公以晚节为海内士表，至明白沙私淑其旨……，自是文章气节，合而为一……。而世所啧啧，尤推独漉、翁山两先生。”^[33]同时他又在文学创作上成就突出，其诗“原本忠孝，根据汉魏乐府，包罗六朝、三唐之胜，而自写其性情际遇，大醇无小疵，直驾宋明诗作者上”^[34]；词则“有《九歌》《九辩》遗旨”^[35]，“声情激越，喷薄而出”^[36]。诸遗老僻居海外，缅怀乡先贤，诵其诗文，复瞻其遗像，更增亲切感，此即作者看到“有人图像流天外”而特别激动的原因。正因为“在天外”，所以古今的距离似乎被拉平了。这一类活动，都带有非常浓厚的文化意味^[37]，从而不断强化具有地缘关系的文化记忆。

讨论到这一点，还有必要提及岭南地理气候的独特性与文化记忆的关系。《文心雕龙·明诗》：“人禀七情，应物斯感，感物吟志，莫非自然。”又《物色》：“春秋代序，阴阳惨舒，物色之动，心亦摇焉。”^[38]大自然的变迁对人类影响很大，不可避免地会打上心灵烙印。长期以来，中国文学中就有伤春悲秋的传统，构成重要的感情描写特色，这一点，在表现家国之变时，往往更为突出。但是，将这个问题放到岭南地区，该怎样认识呢？明代苏浚《气候论》说，岭南气候，“四时皆似夏，一雨便成秋。”^[39]清代温汝能《粤东诗海序》说：“粤东居岭海之间，会日月之交，阳气之所。”^[40]所谓“阳气”，是对岭南地区的一个描述。此地区以高温多雨为主要气候特征，日照时间较长，雨水较为充沛，终年不见霜雪，林木茂盛，四季常青^[41]。但伤春悲秋原是与四季分明的地理特征密切相关的，置于岭南特定的地理中，有着现实情境反差，因此，这方面的文学描写，可以提供独特的认识。

先看对春天情境的描写。张学华《满庭芳·落花，和刘伯端》：“落日啼鹃，荒烟怨蝶，年时瘦损朱颜。园林无主，芳信为谁攀。莫问春归何处，黄昏后、独倚危栏。飘零惯，桃花流水，翻觉此心闲。重来歌舞地，痕留褪粉，梦渺鸣环。乍梨云欲黯，兰露空餐。便作天涯飞絮，娉婷影、羞向人间。休惆怅，乱红如许，茵溷一般看。”^[42]写满天飞絮，遍地落红，以及面对春天的消逝所产

生的心灵活动，其渊源，可追溯到晚唐韩偓《惜花》：“皱白离情高处切，腻红愁态静中深。眼随片片沿流去，恨满枝枝被雨淋。总得苔遮犹慰意，若教泥污更伤心。临轩一盏悲春酒，明日池塘是绿阴。”^[43]近人吴闳生认为其中暗寓“亡国之恨”^[44]，结合当时的形势，以及作者的身世，很有道理。而张氏此作，今昔对比，吞吐幽咽，显然一脉相承^[45]，说明他真的是体会到了韩偓的深意。辛亥革命之后，不少读书人都对韩偓的《落花》诗产生共鸣。像汪兆铨曾在辛亥之冬，作有《买陂塘·落花》：“乍惊心，万红飞尽，霎时新绿都换。东风浑未相催逼，已自雨零星散。君莫怨。君不见、经时到耳蜂声乱。珍丛东畔。算只有一枝，七星幡子，犹自向风展。繁华事，回首不堪重算。陈芳国里公案。杂花野草谁移植，曾被满园都占。君莫叹。君试听、兴亡如说斜阳燕。休弹泪眼。任落溷飘茵，都由自取，更倩阿谁管。”^[46]和张词一样，其中的暮春景象，在现实生活中，也和岭南的实际情形不见得一样，作者从传统意象中借来一些特定的表达，以强化感情的浓度，对清廷被推翻深致感慨，其物象或为虚，但感情却非常真实，这正是由于长期的文学史积淀所搭起的桥梁，在物与我，景与情的关系中，做出了符合实际的选择。

再看对秋天情境的描写。以悲秋来写家国之思，前代并不罕见。人们所熟知的，如南唐李煜《相见欢》（无言独上西楼）^[47]，宋元之际张炎《清平乐》（候蛩凄断）^[48]等都是显例。寓港诸老沿着这一传统，而又体现了鲜明的地方特色。不妨以刘景堂为例。刘景堂，福建上杭人，寄籍广东番禺，1913年移居香港。他有《心影词》《海客词》和《沧海楼词》等，合刊为《沧海楼词钞》。其《心影词》共分两个部分，分别是《丙辰词稿》和《戊午词稿》，丙辰是1916年，戊午是1918年。刘景堂生于1887年，当时不过30岁上下，但里面却有着浓浓的秋意，是其刻意的题材选择^[49]。如《虞美人》16首，《浣溪沙·秋怀》20首，还有《锦帐春·秋痕》《御街行·秋阴》《虞美人·秋吟》《一丛花·秋梦》《风入松·秋影》《碧牡丹·六禾约赋秋声，久不成调，夜来商飙骤发，凄警动人。欹枕无眠，起坐得此》等。如前述《碧

牡丹》：“坐久罗襦暖。银烛欢情短。隔雨红楼，甚处伤心弦管。客燕雕梁，说岁华将晚。玉阶黄叶惊散。 丽譙缓。廿五声奇怨。离魂未秋先断。已是天涯，况又一声南雁。莫厌灯孤，与客愁相恋。明朝千里人远。”^[50]身在岭南，却突出秋色，明显是心理之秋，而不一定是自然之秋。古人认为，大雁南飞，不至岭南，故宋之问《题大庾岭北驿》中说：“阳月南飞雁，传闻至此回。”^[51]作者身在香港，已是天涯，乃传统认为大雁不至之处，却刻意拈出一声雁叫，极写地之僻、情之沮，而非写实。

这样我们看得就非常清楚，寓港诸老，许多本就是岭南人，创作时又身处岭南，但他们却借来了中原风物，从而将自然之景变为心理之景。岭南诗人的前辈屈大均曾经说：“地之尽于海者，于诸夏而俱穷；其不尽于海者，不与诸夏而俱穷。南而又南，吾不知其所底矣。”^[52]在这遥远的地方，中原意识强化了文化想象。对此，刘景堂有一段夫子自道：“余词，寓怀十之八九，即景咏物，十之一二。”^[53]为了这个“怀”，即使是“即景”，也不妨做些改变。就像他的朋友汪兆铨对他的描述：“麟角故人子，漂泊一相逢。酒酣为我起舞，高唱大江东。红豆相思春怨，黄叶凋零秋恨，分付墨花浓。丝竹中年感，哀乐太匆匆。”^[54]浸润在“墨花”中的，不管是春天的红豆相思，还是秋天的黄叶凋零，都是情，而不是简单的景。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文化记忆，是将传统的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符号移植到岭南，从而构成了岭南文学中的一种特殊风貌。^[55]

四 托寓之思与创作传承

龙榆生《论常州词派》：“迨张氏《词选》刊行之后，户诵家弦，由常而歙，由江南而北被燕都，更由京朝士大夫之闻风景从，南传岭表，波靡两浙，前后百数十年间，海内倚声家，莫不沾溉余馥，以飞声于当世，其不为常州所笼罩者盖鲜矣。”^[56]又说：“常州一脉，乃由江浙而远被岭南，晚近词家如王（鹏运）、朱（祖谋）、况（周颐）、陈（洵）之辈，固皆沿张、周之途辙，而发扬光大，以自抒其身世之悲者也。”^[57]

道光初年，阮元在广州创办学海堂，对广东一地的学术发展，起到了重大的影响。番禺陈澧曾掌学海堂十数年，他学问精深，也善词，与常州词派有一定的渊源。梁美曾评其词：“本美人香草之思，为减字偷声之制。”^[58]就从一个重要方面道出其词学宗旨。他的学生汪兆镛，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，侨居澳门也往来香港（曾参加宋台秋唱）。其词“致力姜辛，自搞怀抱”^[59]，即和其师承有关。后来赖际熙等人在香港创办学海书楼，就是延续学海堂一脉。《志学海书楼之原起及今后之展望》说：“书楼成立于民国十二年癸亥岁，初由赖荔垞太史发起，洪兴锦、俞叔文、李海东所赞成。爰集同人，捐资筹办。时港中物力殷富，不崇朝而巨款集。适粤中濠堂盛氏，将藏书出售，内多善本，遂全数购得，赁舍于坚道某号，藏书其中，恣众观览，以仿广州学海堂之例，故命名为学海书楼。”^[60]是则也会将学海堂的某些精神带到香港。

晚清词坛领袖朱祖谋具有全国性的影响力。他在广东的时间虽然不长，但也撒下了词学的种子。像南海潘之博，“雅善倚声，夙为彊村先生所推许”^[61]；创作出“香草美人之作，皆思家忧国之言”^[62]的东莞刘俊庵，也曾拜朱为师。在岭南词人中，他“尤重海南陈洵”^[63]。陈洵作为“传彊村衣钵者”^[64]，为词不仅“悦稼轩、梦窗、碧山”^[65]，更有着“由梦窗以溯清真”^[66]的意识，这体现了常州词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周济所提出的“问途碧山，历梦窗、稼轩，以还清真之浑化”^[67]的学词途径，也和他在序黎国廉《玉蕊楼词钞》时所说的“余年三十，始学为词，得黎季裴藏《宋四家词选》”正相符合^[68]。陈洵和黎国廉交好，自言曾“月必数见，见必有词”^[69]。辛亥后，黎国廉避居香港，在词坛上非常活跃，“提挈吟侣，倡设词社。……岭南词客，灵光独存。”^[70]著名词人张学华即自述：“辛亥后客香江，六禾（黎国廉号六禾）督为词。”^[71]从这些词学资源看，香港词坛发扬常州词派的学说，也是理有必至。

杨其光题陈步墀《双溪词》，认为“如此骚心，那个同怀抱”^[72]，正是从这个角度加以体认的。陈步墀做有16首《菩萨蛮》，题为《无题十六阙》，冠以“无题”，是提醒人们其中可能有着从李商隐

而来的传统，而用了《菩萨蛮》一调，则与常州词派对温庭筠的认识有关。张惠言评价温庭筠《菩萨蛮》诸作时指出：“此感士不遇也，篇法仿佛《长门赋》，而用节节逆叙。‘照镜’四句，《离骚》初服之意。”^[73]将艳词赋予了政治托喻。从这个角度理解陈氏这组词，当能别有会心。如第四首：“鞭丝夕照愉园路。钿车驻试凌波步。妆艳妒秋娘。新开花一双。羨郎云带雨。幻作荷珠去。到处自团圆。人间无限缘。”^[74]明显是一首艳词。词中的女子，提到情人在外的艳福，却用一“羨”字，固然与《诗经·周南·关雎》毛传所谓“后妃之德”有关，更重要的是，这个“到处自团圆。人间无限缘”，不仅是主人公冶游生活的状态，也可以进一步联想为作者寓居异乡的心态，如此，就自然意在言外了。光绪三十四年（1909）前后，潘飞声画有《山塘听雨图》，题咏之人甚多，传到香港后，陈步墀作《采桑子·寄题潘兰史〈山塘听雨图〉四阕》，如“梦回真个销魂也，一叶舟飘。寒怯珠跳。徙倚篷窗听晚潮。姑苏自古风流地，同是兰桡。玉漏迢迢。可由吴娘伴寂寥。”“相思再要图红豆，肠断天涯。人在谁家。一夜风横雨又斜。情知前事都成梦，应记琵琶。面掩桃花。眼底分明隔馆娃。”“羨君短簿名同重，好剪吴淞。汗漫游踪。飞到寒山半夜钟。画中来写迦陵意，问讯征鸿。何日归篷。瘦了梅花又一冬。”^[75]对这四首词，潘飞声评价很高，赞之为“极似王中仙”^[76]。王沂孙（号中仙）是清代词学发展过程中很受重视的一位宋代词家，无论是在浙西词派的系列中，还是在常州词派的系列中，都有很高的评价。特别是在常州词派的建构中，作用非常突出。周济从常州词派的角度，称许“中仙最多故国之感，故着力不多，天分高绝，所谓意能尊体也”^[77]。其咏物词，如陈廷焯所评：“咏物词至碧山，可谓空绝千古，然亦身世之感使然。”^[78]吴梅所评：“大抵碧山之词，皆发于忠爱之忱，无刻意争奇之意，而人自莫及。论词品之高，南宋诸公，当以《花外》为巨擘焉。其咏物诸篇，固是君国之忧，时时寄托，却无一犯复，字字贴切故也。”^[79]王沂孙现存词作只有64首，其中大部分是咏物词，潘飞声说陈步墀的这四首词“极似王中仙”，主要是指其意蕴。苏州是吴

国故地，四首词缱绻旧游，抚今思昔，其中有着浓厚的天涯飘零之感和故国之思，虽然不是咏物，但作为题画，也有咏物的思致，与王沂孙的词，特别是其在宋代亡国之后写的词，精神上有相通之处，体现了常州词派的创作追求。

在常州词派的词学建构中，《乐府补题》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。相关批评家努力挖掘其中的意蕴，做出了托意深远的解读。虽然浙西词派也非常看重这个集子，但只是到了常州手中，其深层意义才得到充分认识，尽管在解读上不无牵强附会之处。香港词坛深受常州词学浸染，对《乐府补题》中的题材和表现手法都非常感兴趣，如杨其光《梦横塘·白荷，用〈金梁梦月词〉韵》：“娇妆不染纤尘，似湘娥蘸影，冷着裳袂。强颊羞眉，仍未肯、粉光弹碎。”^[80]明显就从宋元之际《乐府补题》中来，与吕同老、李居仁《水龙吟·浮翠山房拟赋莲》中的描写，如“素肌不污天真，晓来玉立瑶池里。亭亭翠盖，盈盈素靥，时妆净洗”^[81]，“蕊仙群拥宸游，素肌似怯波心冷。霜裳缟夜，冰壶凝露，红尘洗尽”^[82]，都深有渊源，体现了其独善其身的追求，以及不改初心的倔强。

香港这个地方有着非常复杂的含义，对于英国来说，是殖民地；对于中国来说，是“失地”。这里同时又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地方，是新思想传播的窗口。所以，体现在创作中的寄托，就不一定完全是传统的沉郁缠绵，也有体现时代精神的奋发昂扬。潘飞声自1887年起游历欧洲，曾在德国柏林讲学。1894年来到香港，参与《华字日报》编辑，并创办《实报》。直到1908年，因抨击日本船只私运军火，及多报道抵制日货事，被迫离开。他曾作有《香海填词图》，具体内容虽然暂未能考知，但从当时的反响，可以有所推测。丘逢甲有《题兰史〈香海填词图〉三首》，其二云：“南宋国衰词自盛，各抛心力斗清新。零丁洋畔行吟客，又见江山坐付人。”将割地之事联系到宋元易代，脉络直接前述诸遗老的宋台秋唱。其三云：“此是本朝初割地，年来见惯已相忘。重吟整顿乾坤句，谁更雄心似鄂王！”^[83]浓缩清朝割地求和的历史，认为香港是第一次，此后相继又有台湾和澎湖诸岛等，所以在这个地方，更觉难以为怀。所谓“相忘”，正

话反说，表达内心的无比沉痛。“重吟”二句化用岳飞著名的《满江红》“待从头、收拾旧山河，朝天阙”^[84]句意，因知潘飞声的词作，必也有感伤山河破碎的忧患之心，必也有“整顿乾坤”的恢弘大音。清初以来，词坛盛行填词图，作为文人雅事，既能凝聚群体力量，亦能推动词坛建设，最著名的如《迦陵填词图》，影响后来甚巨。潘飞声所开展的词学活动继承了这一传统，是近代香港词坛非常醒目的一抹亮色。因此，他写出下面这首在词史上负有盛名的《双双燕》，乃是必然的。词曰：“罗浮睡了，看上界沉沉，万峰未醒。唤起霜娥，照得山河尽冷。白遍梅田千井。见玉女、青青两鬓。恰当天上呼船，倒卧飞云绝顶。仙径。有人赋隐。羨蝴蝶双栖，翠屏安稳。烟扃拟叩，还隔花深松暝。谁揭瑶台明镜。应画我、高寒瘦影。指他东海火轮，只是蓬莱尘境。”^[85]罗浮山在广东惠州，而惠州与新安（香港清代属于新安县）相毗邻。词以“罗浮睡了”四字开始，借写罗浮而表达对家国天下的思绪，既指责清廷昏聩，又痛感民众蒙昧，因而期待能够以新思想，唤起民众。末二句写乘风破浪的“火轮”，能够冲破一切阻隔，正表达了心中迫切的期待。这首词以岭南第一名山罗浮山来象征中华，字句意象，托意明显，突出了在现代文明传入的过程中，岭南的重要地理位置，与作者的香港情怀也是密不可分的。

1908年后，潘飞声长期居于上海，仍然和香港文坛保持着密切联系。1911年10月，陈步墀从香港经上海赴日本考察，曾拜会潘飞声，返回香港后，曾集唐人诗句，作诗二首，怀念在上海的潘飞声，其二云：“贾谊上书忧汉室（刘长卿），今朝都到眼前来（元稹）。梦为远别啼难唤（李商隐），潦倒新停浊酒杯（杜甫）。”^[86]说明他们有着共同的情感指向。事实上，虽然潘飞声的思想有其复杂性，但从他在上海的活动看，和诸遗老显然交契很深。1912年5月，他参加了黄宾虹发起的以“保存国粹，发明艺术，启人爱国之心”为宗旨的艺术团体贞社雅集^[87]。1913年，“遗老流寓上海者，有超社之组织”，“以吟咏为遣”^[88]，潘飞声列名其中^[89]。还有刘承干、周庆云主持的淞社，潘飞声也积极参与^[90]。他特别和晚清词坛领袖朱祖

谋交往密切，自1913年相识之后，不断有聚会雅集，诗词酬唱^[91]。1915年，春音词社成立，推朱祖谋为社长。据王蕴章《春音余响》记载：“海上词社，以民初春音为最盛。……匪石时寓沪西，距余寓庐甚近，朝夕过从，因共发起词社，请归安朱古微涵尹丈为社长。涵丈名社曰春音，取互相劳苦之意。一时同社者，有虞山庞燧子、长洲吴瞿安、湘潭袁伯夔、新建夏映庵、杭县徐仲可、乌程周梦坡、番禺潘兰史、长洲曹君直、通州白中磊诸公……”^[92]朱祖谋作为常州词派的重要传人，其以香港为题的词，曾引发了词坛的香港意识，他的学说也影响香港词坛甚深。此时他作为信念坚决的前清遗老，和来自香港的潘飞声又有了如此密切的交往，在这个意义上说，民国初年香港和上海这两个遗老聚集的区域，就以相同的思想感情和文学理念，一定程度上联系到了一起^[93]。辛亥革命之后，曾任清朝翰林院庶吉士的东莞人张其淦，隐居上海，撰《元代八百遗民诗咏》《明代千遗民诗咏》等，隐隐和他的同乡、隐居香港的陈伯陶遥相呼应，也能证明这一点。

总 结

20世纪初的香港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。一方面，这里是倾覆清朝统治的重要摇篮之一，孙中山的不少革命思想是在这里成熟的，香港涌现出不少革命党人，甚至广州起义也以香港为重要的策源地；另一方面，辛亥革命后，香港又吸引了一批遗老迁徙流落于此，强烈缅怀前朝。事实上，在辛亥革命之后，很多城市都有着鲜明的遗民文化，为人们所熟知的如北京、天津、青岛、上海等，香港虽然没有那些地方的规模，但也是一个重要的所在，有其独特性。本文即以遗民文人群体的词作为例，在这方面做些补充。

从整体上看，辛亥革命前后一段历史时期的香港词坛，其基调是保守怀旧的。这批词人有着较为开阔的视野，却同时又有着较为封闭的心态，这构成了一个既矛盾又统一的结合体。他们笔下的香港生活，经常是其浓厚的遗民情怀的体现，这固然说明了他们顽固的文化保守立场，但却也从一个侧面

可以看出他们对故国文化的一种留恋。而从创作立场上看，他们继承了嘉庆道光之后开始盛行的常州词派的学说，往往带有比兴寄托之意，从而呼应了整个近代词坛的创作风气。

这批读书人多来自广东，是在改朝换代过程中广东的一批读书人的代表。寓居香港期间，他们通过各种方式保存文化记忆，努力挖掘广东一地的历史资源，建构气节论和正统观，并以此作为砥砺自己文化立场的精神动力。他们也以一定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创作，服务于这一目的。在这个意义上，他们的文化活动有着鲜明的地方色彩，又是和北京、天津、青岛、上海等地的遗民文化不大一样的地方。

民国建立后，朱祖谋采取不合作的态度，自1915年即定居上海，以遗老自居，常与诸遗老作文酒之会。他在晚清词坛上是举足轻重的人物，影响岭南词风甚巨，而他在词体文学创作中所提出的香港意识，他在词学活动中所展示的故国情怀，也都在香港得到了充分的发扬。以此相贯穿，不仅可以从词学的角度看到当时词坛彼此的关系，而且可以从遗民文化的角度，看到地域之间的勾连。^[94]

[本文的研究先后受到香港研究资助局(UGC)和香港浸会大学研究基金(FRG)的资助]

[1] 左宗棠:《左文襄公全集》，第2670页，文海出版社1964年版。

[2] 钱仲联:《清诗纪事》，第14册，第9710页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—1989年版。

[3] 朱祖谋撰、白敦仁笺注:《彊村语业笺注》卷一，第166页，巴蜀书社2002年版。

[4] 苏轼:《苏轼诗集》卷四十三，第2365页，中华书局1982年版。

[5] 参看程中山主编:《香港文学大系·旧体文学卷》，第45—46页，商务印书馆(香港)2014年版。

[6] [7] 参看邹颖文:《香港古典诗文集经眼录》，第11页，第12—13页，中华书局(香港)2011年版。

[8] 温肃:《陈子丹五十寿序》，《温文节公集》卷三，第157页，学海书楼(香港)2001年重印本。

[9] 刘景堂:《玉蕊楼词钞跋》，见黎国廉《玉蕊楼词钞》卷

末，民国二十五年刊本。

[10] 罗五洲:《文学研究录》第4期，1922年1月。见黄仲鸣:《香港三及第文体流变史》，第61页，香港作家协会2002年版。

[11] 何乃文等:《香港名家近体诗选》，第629页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。

[12] 刘智鹏、刘蜀永编:《〈新安县志〉香港史料选》，第115页，和平图书有限公司2007年版。

[13] 林则徐:《使粤奏稿》卷七《会奏穿鼻尖沙嘴叠次轰击夷船情形折》，《林文忠公政书》，第151页，中国书店1991年版。

[14] 关于陈伯陶对九龙宋代遗迹考订的行为及其意义，参看高嘉谦《刻在石上的遗民史——陈伯陶、〈宋台秋唱〉与香港遗民地景》，载其《遗民、疆界与现代性：汉诗的南方离散与抒情》，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版。

[15] 苏泽东:《宋台秋唱》，第5页下，影印民国原刊本1979年版。

[16] 方宽烈:《二十世纪香港词钞》，第174页，东西文化事业公司2010年版。

[17] 高嘉谦:《刻在石上的遗民史——陈伯陶、〈宋台秋唱〉与香港遗民地景》，载其《遗民、疆界与现代性：汉诗的南方离散与抒情》，第329页，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版。

[18] 蔡守:《引驾行·九龙春游》，《寒琼遗稿》，民国三十一年刊本，转引自程中山:《香港文学大系·旧体文学卷》，第242页。

[19] 张学华:《閤斋词》，第1页下—第2页上，广州蔚兴印刷场印本。

[20] 刘伯端《沧海楼词》，黄坤尧编纂《刘伯端沧海楼集》，商务印书馆(香港)2001年版。

[21] [74] 陈步墀:《双溪词》卷二，黄坤尧编《绣诗楼集》，第244页，第241页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。

[22] 1924年10月14日《华字日报》，转引自程中山《开岛百年无词会：二十年香港北山诗社研究》，《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》第53期，第298页，2011年7月。

[23] [75] 陈步墀:《十万金铃馆词》卷二，《绣诗楼集》，第271页，第261—262页。

[24] 屈兴国:《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》引，第35页，齐鲁书社1983年版。

[25] 辛弃疾:《辛弃疾词集》，第22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

2016年版。

[26] 杜甫撰、杨伦注:《杜诗镜铨》,第433页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。

[27] 崔师贯:《北邙类稿·白月词》,大良中和园民国二十二年版。转引自程中山《香港文学大系·旧体文学卷》,第208—209页。

[28] 王粲:《登楼赋》,俞绍初校点《王粲集》卷二,第9页,中华书局1980年版。

[29] 永瑢等: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百八十八,《中州集》提要,第1706页,中华书局1985年版。

[30] 顾炎武:《广宋遗民录序》,《顾亭林诗文集》卷二,第33—34页,中华书局1983年版。

[31] 陈伯陶:《胜朝粤东遗民录》,第27页,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。

[32] 陈步墀:《双溪词》卷三,《绣诗楼集》,第251页。

[33] 吴道镛:《屈翁山先生墓志铭》,载《屈大均全集》附录三,第2116页,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。

[34] 王源:《屈翁山诗集序》,陈永正《屈大均诗词编年笺校·诸家品题评论辑录》,第1358—1359页,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。

[35] 張德瀛:《词征》,唐圭璋《词话丛编》,第4177页,中华书局2005年版。

[36] 叶恭绰:《广篋中词》卷一评屈大均《紫萸香慢·送雁》,杨家骆:《历代诗史长编》第22—23册,第32页,鼎文书局1972年版。

[37] 程美宝即指出广东地区的遗民的活动更倾向于文化的性质,见其《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:晚清以来“广东文化”观的形成》,第195页,三联书店2006年版。

[38] 刘勰撰、周振甫译注:《文心雕龙译注》,第48页、第493页,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。

[39] 汪森:《粤西文载》卷五十七,影印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集部第1472册,第23页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。

[40] 温汝能纂辑,吕永光等整理,李曲斋、陈永正审定:《粤东诗海》,第15页,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。

[41] 这些对岭南气候的描述,说的是常态,并不意味着没有特例,比如光绪十八年(1892)冬,岭南地区就曾连续几天落大雪,当时人视为奇观,多见于文字。

[42] 张学华:《閩斋词》,第1页下。

[43] 韩偓撰、吴在庆校注:《韩偓集系年校注》卷二,第467页,中华书局2015年版。

[44] 吴闳生:《古今诗范》卷十六,第239页,台湾中华书局1971年版。

[45] 张学华另有《高阳台》,标题是:“曩岁和伯端落花词,二十余年矣。顷伯端复以落花词索和,感伤时事,唯有悲愤。为填一阙。”其中有“伤春费尽冬郎”句,即明言和韩偓的渊源。《閩斋词》,第5页上—下。

[46] 汪兆铨:《惺默斋词》,载《惺默斋集》,第10页下,民国八年超华斋刊本。

[47] 曾昭岷等:《全唐五代词》,第767页,中华书局1999年版。

[48] 张炎:《山中白云词》,第83—84页,中华书局1983年版。

[49] 黄坤尧在其《论刘景堂沧海楼词》一文中也指出了这一点。见《香港诗词论稿》,当代文艺出版社(香港)2004年版。

[50] 刘景堂:《心影词》,《沧海楼词钞》,第26页下—27页上。

[51] 《全唐诗》,第640页,中华书局1979年版。

[52] 屈大均:《广东新语》卷二,《屈大均全集》第4册,第26页,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。

[53] 刘景堂:《心影词自序》,《心影词》卷首,见《沧海楼词钞》。

[54] 汪兆铨:《水调歌头·香港赠刘伯端景堂》,《惺默斋词》,载《惺默斋集》,第13页上—下,超华斋刊本。

[55] 当然,文化记忆的层面还可以更丰富一些。如著名词人杨铁夫濡染晚清词风,师法梦窗,1922年旅居香港,作《吴梦窗词笺释》。其第二版自序:“去年旅香江,僻陋在夷,无可与语,因以读梦窗词之所得,选其一百六十七首而笺释之。”1935年,钱仲联为此书作序:“梦窗生丁未造,白雁南来,鼓鞞之思,禾黍之悲,一以倚声发之。乃铁夫所遇,不幸与之同,当把卷旁皇之际,云海愁思,荡魂撼魄,……铜仙铅泪,相对决澜而不能自己也。”这又是从吴文英词中找到的文化记忆。见《吴梦窗词笺释》,第13页、第5页,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。

[56] 龙榆生:《论常州词派》,《龙榆生词学论文集》,第387—388页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。

[57] 龙榆生:《近三百年名家词选·后记》,第234页,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。按,此书197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重版时,“陈”改为“郑”(第226页)。但1979年时龙榆生已逝世,这一改动,并未说明原因。

- [58]《论词六绝句序》，吴兰修编《学海堂集》三集卷二十四，第1475页，孙克强等《清人词话》，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。
- [59]夏敬观：《忍古楼词话》，唐圭璋《词话丛编》，第4761页。
- [60]学海书楼1948年印发之文，转引自罗林香《香港与中西文化之交流》，第220页，中国学社1961年版。
- [61]龙榆生：《忍寒漫录》，《龙榆生全集》第九卷，第104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。
- [62]王瑞瑶：《花雨楼词草序》，龙榆生《词学季刊》第2卷第4号，第197页。
- [63]赵尊岳：《人往风微录》，载陈水云等整理《赵尊岳集》，第799页，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。
- [64]蔡桢：《柯亭词论》，唐圭璋《词话丛编》，第4909页。
- [65]黄节：《海绡词序》，刘斯翰：《海绡词笺注》附录，第495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。
- [66]熊润桐：《陈述叔先生事略》，刘斯翰《海绡词笺注》附录，第498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。
- [67]周济：《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》，唐圭璋：《词话丛编》，第1643页。
- [68][69]陈洵：《玉蕊楼词钞序》，黎国廉：《玉蕊楼词钞序》卷首，民国二十五年（1936）刊本。
- [70][71]张学华：《林音集序》，黎国廉、陈洵：《林音集》，第1页上，第1页上，蔚兴印刷场承印。
- [72]陈步墀：《双溪词》卷首，《绣诗楼集》，第229页。
- [73]张惠言：《词选》，唐圭璋：《词话丛编》，第1609页。
- [76]潘飞声撰、谢永芳等校笺：《在山泉诗话校笺》，第404页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。
- [77]周济：《介存斋论词杂著》，唐圭璋：《词话丛编》，第1635页。
- [78]陈廷焯：《白雨斋词话》卷七，唐圭璋：《词话丛编》，第3937页。
- [79]吴梅：《词学通论》，第93页，商务印书馆（台北）1968年版。
- [80]杨其光：《花笑词》，陈步墀：《绣诗楼丛书》第五种，第18页上。
- [81][82]唐圭璋：《全宋词》，第3424页，第3426页，中华书局1965年版。
- [83]丘逢甲撰、丘晨波主编：《丘逢甲文集》，第178页，花城出版社1994年版。
- [84]唐圭璋：《全宋词》，第1246页，中华书局1965年版。
- [85]潘飞声：《饮琼浆馆词》，第4页下—第5页上，宣统元年丰源印书局《晨风阁丛书》甲集。按“仙径”，原作“仙洞”，考虑到潘飞声此作是和黄遵宪原韵，而黄词此处作“径”，因改。又，虽然黄词写在前面，但“罗浮睡了”四字却是潘飞声先有的感慨，他们心有灵犀，才有了这二首名垂青史的唱和。
- [86]陈步墀：《游吴纪程》，黄坤尧编：《绣诗楼诗二集》卷三，第144页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。
- [87]王中秀：《黄宾虹年谱》，第91页—94页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年版。
- [88]郑逸梅：《艺林散叶》，第318页，第317页，中华书局1982年版。
- [89]参看曹辛华：《民国词史考论》，第83页，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。
- [90]参看林志宏：《民国乃敌国也：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清遗民》第一章《异乡偏聚故人多：活动范围》，第52—53页，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9年版。
- [91]如1925年1月，朱祖谋以《烛影摇红·乙丑元旦和闰枝》属潘飞声唱和，潘飞声次韵作《烛影摇红·古微丈以元旦词属和次韵》。潘飞声撰、谭敬编《说剑堂集·词集》，第23页上，民国二十三年上海铅印本。
- [92]王蕴章：《春音余响》，《同声月刊》第1卷，第178页，1940年。
- [93]另举一例，1924年香港北山诗社的词体文学雅集中，有一次即题为《霜花腴北山堂拟赋菊用吴梦窗原韵》，显然和晚清以来朱祖谋等人所倡导的学梦窗的词风密切相关，而其中的参加者杨铁夫后来还专门到上海从朱祖谋学梦窗词，并以笺释梦窗词而享誉词坛，并不是偶然的。

[作者单位：香港浸会大学]
责任编辑：李超